

长江学术



第六辑

武汉大学文学院 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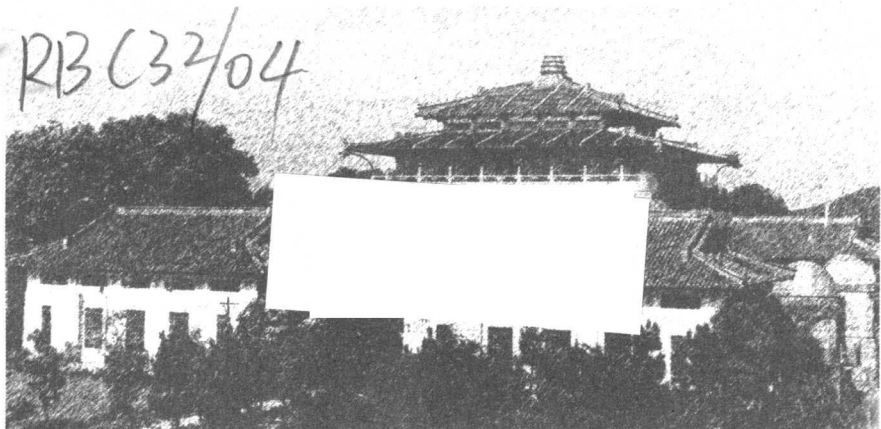
C53/309

长江学术

第六辑

武汉大学文学院 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XUESHU



赠阅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江学术/武汉大学文学院、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54—2332—9

I. 长…

II. 武…

III. 学术论文—中国—当代

责任编辑: 常江 责任印制: 吴竹敏

封面设计: 小加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 87679309 传真: 8767930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 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n 传真: 87679360

印刷: 武汉市精伦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6.25 插页: 1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00 千字

I. 1794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87679307)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文化研究

中西方价值：关于普遍伦理的跨文化对话的反思

.....(德)卜松山(1)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评熊召政笔下的张居正形象.....何西来(5)

存在的孤独和孤独的超越

——论冯至叙事诗中的现代意识..... 陈国恩 刘悠扬(16)

《阿Q正传》的改编困境..... 金宏宇 原小平(23)

革命文艺中的叛徒叙述

——重读《青春之歌》..... 张 均(31)

曾卓“地下”诗歌创作的心理分析..... 李遇春(38)

名家专论

试论吴伟业的文学创作

——以其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关系为中心.....章培恒(46)

刘永济学术研究

钩深致远 历久弥光

——论析刘永济对“龙学”发展的贡献.....罗立乾(58)

音调危苦 气格沉雄

——读刘永济先生《诵帚庵词》..... 刘庆云(68)

刘永济学术研究讨论会论文摘编.....(76)

文艺学研究

试论边缘学科生长点对文学研究的意义..... 张荣翼(91)

- 试论《文心雕龙》的诗性特征……………李建中(102)
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对中国左翼艺术的影响……………鲁 鄂(109)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

“异类想象”的文化解读

- 中国“狐仙”与西方“元素精灵”之比较……………(美)韩瑞亚(115)
韩国李朝汉诗艺术与诗学的中华化倾向……………徐 江(123)
论和歌、俳句的汉译……………扬 阳 石观海(129)

应用语言学研究

- 关于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于根元(140)
新词语的规范度与规范值……………牟云峰(145)
再谈交际理论……………司红霞 张 彤(150)
言语组合应用试析……………杨合鸣 周筱娟(157)

古代汉语研究

- 《全元散曲》中的“被”字句……………卢烈红(162)
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对常用词的选择……………陈秀兰(167)
试论《龙龕手鏡》中的构件易位异写字……………邓福祿(175)

《故训汇纂》研究

新世纪一部语文辞书力作

- 读《故训汇纂》……………赵振铎(183)
以马部字为例看《故训汇纂》的价值……………萧 红(188)

校勘·训诂·考据

- 中华书局本《三国志》勘误七则……………王文晖(193)
《左传微点注》与白兆麟先生的训诂学思想……………乔俊杰(198)
三袁与李贽会晤时间及地点考辨……………戴红贤(204)

序跋集萃

开创文艺民俗学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总序·····陈文新(211)

《阮大铖研究》序·····陈美林(215)

硕博论坛

打开个人情感与想象世界的通道

——论刘震云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刘 勇(219)

《暴风骤雨》的叙事裂缝·····郭冰茹(227)

试论朱自清的新诗理论·····乐 云(233)

“程度副词+名词”中的名词小议·····王 红(239)

学术争鸣

曹操缘何居下品·····肖 波(244)

“淫诗”即情诗

——兼与莫砺锋先生商榷·····罗俊华(249)

珞珈述林

《论钱钟书对韩愈李贺诗的艺术发微》(15) / 《中国新诗“发展论”概评》(75) / 《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90) / 《论穆旦诗歌翻译对其后期创作的影响》(161) / 《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修订版)(210)

博士论文撷英

《〈五方元音〉音系研究》(45) / 《沈从文的生命诗学》(128) / 《用典研究》(139) / 《朦胧诗后先锋诗歌》(214)

《长江学术》稿约

中西方价值观： 关于普遍伦理的跨文化对话的反思

[德] 卜松山

盲目的自大是建立在这样板的假定之上的：全世界的居民要想过一种幸福生活就需要成为欧洲人。

——约翰·高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
《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

当铁幕落下，其巨大的政治和思想隔阂消失后，按照文化差异来划分世界似乎再次成为时尚，塞缪尔·亨廷顿那部颇有争议的著作使这一点变得更加突出。他著作中得出的结论是颇值得怀疑的，他的前提——即勾勒出几大文化圈的差异的轮廓，已经引起了争论。尽管如此，价值讨论仍需要以这些前提为起点，即强调文化差异，但又不得出亨廷顿那样以美国中心的政治权力观为标志的结论。毋庸置疑，美国作为今天唯一的霸权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尽管这样的发展被称为全球化，但是美国的金融、商业和娱乐业开创了这一发展并在今天继续刺激着这一发展。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不渗透着美元、微软、CNN、好莱坞电影、电视节目、杰瑞·斯皮林格、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由此看来，其实把这种普遍发展称为美国化而不是全球化更为恰当。我们如何以此为起点，以一种公正的方式来讨论价值的普遍性问题呢？即如同维护生态圈里的差异那样对待文化差异并予以重视？

西方普遍主义的根源，就是基督教。在基督教价值中心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世俗的观念和价值：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进步观念的结合，被称之为“西方的合题”。在西方式的现代化转化为一种全球的或普遍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过程中，它变成了一种推动力。在这个综合过程中，不仅地球的一半被欧洲人殖民化，而且“单维度的进步秩序”被强加于具有众多民族的世界。正如主持“联合国文教组织”“世界普遍伦理工程”的哲学家金丽寿所说：“这一合题在人们的思想和事务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使许多民族和社会一致把西方化当作实现未来的唯一途径。在现代化的旗帜下，他们抛弃了已熟悉的真理、价值和生活方式，把西方化的程度看做衡量进步与退化的标准。”

在走向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发展的文化/宗教根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在跨文化问题的讨论中，应该看到基督教传统的某些品质在转化为一套世俗的价值体系的过

程中仍保留了下来。譬如，作为基督教重要部分的普遍的传教热情，像一根接力棒一样被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基督教信仰到新的市民宗教：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民主和人权。即使自由主义，正如查尔斯·泰勒曾经指出的那样，如同基督教一样，是一种“战斗的教条”。人权的观念，它的根源及其正当性（人的尊严的观念和神圣/自然法）都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传统，至少它的某些激进的主张，即使不是原教旨主义的，但也变成了世俗教义的一种新形式，即一种极端、绝对的、准宗教的倾向。

如果我们要打破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对世界的影响的平衡，那将会导致两种不同的态度：那些强调物质、社会进步、科学、民主、人权观念和自由贸易（不平等双方之间）的人，会看到它积极的一面，于是更加坚定这一信念：“我们（欧洲/美国）的思维方式比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具有更加压倒一切的优势。”^①但是，我们也不能无视这种全球性的征服所付出的代价（或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各个阶段各种形式的种族灭绝，最后，至少不应忽视无情的经济增长和进步观念造成的环境退化，如全球性的气候变化。这是一个更加宽广的语境——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在这个语境中，我们还应对普遍伦理观作出评价。

那么，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还需要一种全球或普遍伦理吗？西方核心的价值，后基督教的价值，法国大革命或美国宪法的世俗价值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模范价值吗？西方社会是其他社会的模范社会吗？这样一种建立普遍伦理的普遍主义行为难道不正是一种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伦理普遍主义而把欧洲中心的烙印打在世界之上的企图吗？

如果我们把儒教在东亚和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加以比较的话，那么，两方面都显示出一种正、负因素的混合特征。首先，儒教——即使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一种宗教，而且在历史上同基督教一样具有异质性——当然具有同基督教一样的信仰功能：在过去 2000 多年，儒家思想在中国和东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也具有普适性的内容（可以在“天下为公”“天人合一”中看到），但与基督教相比，它缺乏狂热的传教热情，相反，它是作为一种和谐的社会、道德秩序的典范学说而在东亚其他地区传播的。同基督教教会不同，虽然作为一种机制，儒教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消失了，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后儒教，它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伦理基础。

当我们把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史进行比较而予以考察时，我们发现，虽然儒家伦理的现代形式在与西方哲学的相遇中已发生了变化，但它还没有经过一个比较而言抽象化的过程，但总的说来，它仍然是一种基于社会的美德伦理学，即它不是孤立地看人，而是把人放在关系语境，包括整个宇宙的语境中来看待。在儒家伦理中我们也看到了普遍性的特征，如“以天下为己任”，或“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也看到了理性原则，如互助、忠恕（正如在黄金规则中那样），但它们强调的不是抽象原则而是具体的行为和修养：关爱、慈仁、克己、重人伦和社会和谐。因此儒家思想可以被归结为一种温和的（美学的）普遍主义而与西方强硬的（理性的）普遍主义相对。

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不仅具有一种伦理的、类似于宗教的功用，而且具有政治功用。儒家激励政府的是通过科举选择知识精英，这样的知识精英，因为他参与国家管理，不可能形成一种与政府相对抗的态度，而对下还要有家长似的仁爱之心。而在中国传统中，社会被看做是一种家庭的扩展，对二者而言，竞争是有害的，它会破坏家庭

和社会的和谐并最终导致混乱。

而西方建立在社会契约上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政府）和个人（公民）之间的对立，则产生了市民社会和公众空间的概念，公民观念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独立性使之与政府相对立。而儒家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则要服务于政府，对上，对违反道德的行为予以诤谏，对下，则要关心百姓的福利，这样的态度仍然存在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倾向是“自上而下”的，相反，西方公民社会则是“自下而上”的（后者符合民主观念，因此在西方被视为在政治意义上是正确的）。还没有解答的问题是，政治与道德的结合这一特殊的文化资源是否仍对中国和东亚的民主发展起作用呢？

问题依然是，如同在经济领域的全球化那样，我们今天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全球性的或者普遍的伦理——即惟一的伦理？当然，还有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德，如慈善和正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它们成为现代西方福利社会和法规的基础时，它们却似乎从公众话语中消失了。也很少有道德准则具有一种普遍性，因为它们或者太浅显，或者有可能被一些合乎逻辑的相反的例证所驳倒，因而消失在视野之外。其中一个就是黄金规则，另一个则是我们从童年时代从父母的惩戒中想到的问题：“如果人人都那样做结果会怎样？”即普遍推广的原则，也即康德的绝对命令的最浅显的表现。至于黄金规则，阿米泰·爱兹奥尼近来进行了富有创建性的扩充，试图弥合社会义务和个人自由主义之间的裂缝：如果你要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尊重你的个人自由，你也要何种程度地尊重社会的道德秩序。普适性的原则虽然作为通常公正的尺度，在强调个人和少数权利的时代，在国际政治权力的竞争场上已经无立足之地了。他也提出了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之间的公平问题：如果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像普通欧洲人和美国人那样消耗同样多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开两三辆汽车，污染环境，那将会怎样？那么，我们顾左右而言他（不在这里，而在别的语境中用这一标准），似乎在剪裁道德以适合于自私自利的利益。无论如何，我们行使自由的方式，以他人特别是以后代为代价的生活，不能普遍推广。“人类只有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的人，可以生活在他人的代价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在环境的退化中，我们的自由观念（与权力观念紧密相联）的确已走到尽头了。

道德也需要本土基础，因为道德存在于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存在于一种文化传统中。普遍主义的观点过于抽象而不能产生任何吸引力，或者无法传达一种责任感。米歇尔·瓦尔茨也对此有所评述：“每个社会具有不可避免的特殊性，因为它拥有自己的成员和记忆，那些成员不仅拥有自己生活的记忆，而且也拥有社会生活的共同记忆。相比之下，人性虽也有自己的组成部分，但却没有记忆，因此也就没有历史。文化、没有习俗的实践、没有熟悉的生活方式，没有节庆，也没有共同的对社会意义上的善的理解。”因此，普遍性和特殊性，伦理的全球性和地方性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按照中世纪哲学家尼古拉斯·库萨的“多元性中的统一性”的观点，每种单一的事物正是宇宙之整体性的一种体现，事实上甚至包含着这种整体性。有趣的是，宋代的新儒家们也有同样的观点，譬如程氏兄弟，他们坚持“理一分殊”。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了，我们不仅在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这样的欧洲哲学家的思想，而且也在孔、孟、朱熹、王阳明这些中国哲学家的传统中，发现了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思想。中国的哲学家没有受到欧美知识分子的关注，只是因为——与他们的东方同行不同——西方人，只熟悉一种思想，即他们自己的传统，今天

大部分人依然如此。

如果我们在一个跨文化的语境中进一步追求一种普遍伦理的观念，那么，强调非西方价值中的普遍意义，特别是那些能够弥补西方个人自由和权利要求的义务观念，是十分恰当的。朝鲜学者 HAHM CHAIBONG，从普遍主义的角度，维护儒教，强调把儒教限制在中国和东亚地区将有损于它的宗旨。如他所说，毕竟罗马教皇没有把基督教信仰的意义只限于欧洲，自由主义者也不会把个人权利的意义理解为只属于西方国家。有趣的是，儒教中提出的问题在过去一二十年中已在西方引起了注意，而且也受到主张社群主义的思想家的关注。因此，它已具有某种跨文化的影响和特征。

不仅在西方（基督教和后基督教）而且在儒家传统中，确实存在着重要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思想，且不提其他文化的贡献。尤其是鉴于西方世俗价值占主导地位的事实，它们至少在本土完成了一种有价值的平衡功能和补充功能，今天，欧洲中心的发展模式使西方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生态危机，应使我们意识到，换一种思维方式也许会使全世界大大受益，我们也应该欢迎来自其他文化的知识分子为解决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作出贡献。为了在这个星球上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和人类的繁荣，这些非西方的价值也许同人权一样重要。关键是，一种权利伦理学，作为最低限度的伦理学，缺乏一些重要的内涵。譬如，关心他人、友爱、人伦、婚姻、家庭、诚信、义务等这些范畴，不能只被作为权利问题提出。否则，（今天已在逐步这样做）就会失去其重要性。我们的确需要一种权利语言，但我们也需要一种关爱和责任的语言。换言之，法律是必需的，但它不能完全替代社会的伦理基础。

① Klaus Michael Meyer-Abich 《世界的整体性优于统一性》，见《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个争论》第 207 页，Wilhelm Luetterfelds and Thomas Mohrs (eds) Darmstadt 1997。

（作者单位：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

责任编辑：於可训

评熊召政笔下的张居正形象

何西来

张居正是有明一代为数不多的干出了一番事业的宰辅名臣，熊召政选择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作为自己长篇新作的主人公，并拿他的名字做了这部四卷本小说的总题。在熊召政的笔下，张居正既是最重要的人物形象，又是全书结构的中心和支点，因此，这个人物的成败，关系到全书的艺术水平和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就作为艺术形象的张居正，谈一些看法，以就正于专家、读者和作者。

那是一个打上了张居正性格烙印的时代

《张居正》展开下面描写的时间跨度约十一二年，即隆庆六年到万历十一年。隆庆皇帝朱载堉驾崩之后，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结盟，取得新即位的万历帝朱翊钧，特别是他的母亲李太后的信任，驱逐了同为顾命大臣的高拱，升任首辅。这是张居正第一个，也是最关键、最带基础性的胜利。正是这个胜利，成为此后由他主持并推行的“万历新政”的奠基礼。语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是不谋，而是想谋而不可得。所以谋政，首先是谋取权位，有了权位的桢杆，就能够实现其所谋之政，就能够实现其政治抱负。张居正正是这样做的。当时，万历帝只有十岁，还是个孩子，两宫太后又久居宫帟，即使象李太后这样很有见识的人，也很难直接秉持朝政，他们只能把权柄交给信得过的重臣，由他统驭。他们选择了张居正。这就为张居正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干，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舞台。

张居正以帝师之尊，首辅之重，独秉朝纲。他不仅利用自己的权位，厉行改革，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基础，而且按照圣帝明君的标准和要求标准培养幼主，并严格规范他的行为与思想。虽然作为臣下，张居正手中的权力受制于李太后母子，他必须很谨慎地处理好这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关系，取得他们的宠信，但是实际上，一应军国大事，都由他来决断和掌控。这种摄政的地位，从他做首辅，到他去世的10年间，基本没有变过。而他又是一个干练的能臣，接手的是一个荒淫昏病皇帝留下的烂摊子：官员贪墨，吏治腐败，豪强巨室聚敛无度，国库空虚，税制混乱，社会矛盾空前紧张，诸多弊端积重难返，王朝统

治风雨飘摇。这些无疑增加了他施政的困难，成为对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的严峻考验，然而，同时也为他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的改革家的施展才干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张居正抓住了这个机遇，他知道那个时代需要什么，他能做些什么。他是一个敢于任事，有行动精神，有坚强意志，果断而又有足够谋略的人。通过“万历新政”的实施，他给自己主政的十年，留下了自己性格的印记。在朱明王朝延祚的 276 年间，称这 10 年为“张居正时代”，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

熊召政通过对张居正的描写，带起了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的描写，这是因为张居正的位置处于那个时代最高权力的核心，从对他的描写入手，便于联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便于描写各色人群的生存状态。熊召政正是通过张居正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三教九流的不同人物命运的描绘，展开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就一个历史人物给他生存的时代打上了自己性格的烙印，是说这个历史人物适逢其时，按准了时代的脉搏。在影响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些重要方面，起到了阻碍或推动的作用。他们不仅以自己的意志、决断和行动，影响潮流的行进方向，而且由于他们所处地位的重要，某些历史过程的迟速和轨迹，包括行进方式，甚至都会受到各种历史人物的性格的影响。以张居正的情况而论，在他主政期间，推行了许多带有战略性的改革措施，每一项政策的实施，都牵涉到成千上万人的利益与命运，并且最终影响着施政的全局。

就我们阅读印象而言，熊召政对此显然是相当自觉的。他把人物对时代的影响和时代对人物的制约，都具象化到具体的细节，具体的生活场景，具体的命运浮沉和性格冲撞中去，只是在最终的合力方向上，体现出张居正左右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力量。

在时代环境的描写上，作家虽然主要着力于主人公一系列改革举措及其激起的社会影响的描绘，然而他也往往荡开去，写一些与此不甚相变的文化景观和历史场景，如写冯保去白云观礼拜丘神仙时，对于白云观庙会的热闹情景的描写等。此类描写所在多有，虽然与情节主线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展开，并无多少直接关系，但在具体文化历史氛围的营造上，增强环境描写的实感上，丰富作品的叙事结构和叙事节奏上，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总之，熊召政在他的《张居正》里，对主人公由张居正的描写，带起了对张居正那个时代的描写，提供了丰富的让读者仿佛能够置身其中的社会生活图景，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基本统一，这在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在影视作品“戏说”成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被扭曲得面目全非，因而对观众和读者形成不可容忍的误导时，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权力“铁三角”

张居正摄国，独掌朝柄，令行禁止，言出法随，实际上处于权力运作的制高点。但在名分上，他却不是最高统治者，而只是朱明王朝的臣工，那怕是位居首辅，也仍然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这“一人”，当然是小皇帝朱翊钧，但因为还是孩子，所以他的意志，相对于张居正而言，其实主要来自乃母李太后。所以张居正之上的这一人，在万历帝成人并亲政之前只能是李太后。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欣赏是双重的，一方面信任他的忠心，

欣赏他的人格和政治智慧，几乎支持他的一切政治举措，相信他能够辅佐自己的皇儿坐稳江山，她甚至把对小皇帝的教育培养大权一并交到他的手里；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寡居的聪慧美丽的年轻女人，她的内心也还萌动着某种隐秘的不便明言却又确实存在的爱悦之情。在《张居正》里，熊召政写李太后与张居正的这种关系，写得充分、含蓄而又极有分寸感，是颇见功力的。可以见出这位作者洞幽察微的眼光和深入肌理的艺术想象力。李太后需要张居正这样的能吏、干吏为她和她的儿子撑持朝政，至少在她的儿子能够自主政秉钧之前；而张居正也需要自李太后那里获得支持，获得他手掌重权的合法性，使他的想法和举措，变为“圣意”，以“圣旨”、“上谕”的形式颁行天下。张居正必须小心谨慎地，竭忠尽智地维护好这个关系，加强这个关系，不能有半点差错。只要这个关系稳定，他就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就既能重权在握，一言九鼎，而又不亏忠直干练的名节。

冯保在以张居正为核心、为主导的摄政时期的权力结构中也处于重要的地位。冯保取得了李太后的信任，又在张居正的配合下，先是赶走了先帝颇为宠信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取而代之，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内总管，又暗结张居正，罢了躁急跋扈，颐指气使的首辅高拱的官，使张居正得以自次辅升任首辅。冯保长张居正五六岁，身历数朝，老谋深算，掌控内廷。明代中叶之后，内廷权重，司礼监主事者常常干预朝政。其权势时不时盖过外廷。外官亦多有贿买和勾结内廷而谋求升迁者。冯保也是这样。熊召政对此有充分的描写。在内廷，冯保的权力受控于李太后母子，以李太后的宠信为前提，情况略同于百官首领的张居正。但也有不同，李太后对他的尊重是一位忠顺奴才的尊重，却从未将外廷重权托付给他，他在朱翊钧那里的地位也只是“大伴儿”，而不是如张居正似的威严的帝师。但是他的地位很重要，来自内阁和百官的奏折要经过他而递给皇上和太后，皇上和太后的旨意又常常通过他而传达给内阁及文武百官，这种上传下达的关键部位，使他身价倍增，何况他还掌控着东厂的和锦衣卫，掌控着钦犯的定讞司法大权和派眼线（特务）对文武百官实施的侦察、监视之权。

张居正是聪明透顶的大吏，他既能在冯保的鼎力襄助下夺得了阁揆的权位，当然也就懂得保有这权力时与冯保结成政治联盟的重要。不仅如此，就是他推行的一些重大举措和改革，也都离不开冯保的支持，只要冯保从中做梗，他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何况是开创“万历新政”这样事关全局的一系列战略步骤。冯保和张居正都很懂得他们的政治结盟的重要，这关系，无论对于谁，都是性命攸关的。他们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始终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之中。连他们的管家徐爵和游七，亦私交甚好。

然而，冯保又是一个狡黠、贪婪、残忍的人，他受贿、贪财，集奴性与狼性于一身。这就不能不在张居正整肃吏治，惩办贪墨官员时产生一些齟齬，有时甚至濒临较劲的边缘。比如惩治胡自皋一案，就碰上了与冯保较劲的事。胡自皋因贿买冯保而官至两淮巡盐御史，张居正当然知道他与冯保的关系。巡盐御史是尽人皆知的油水很大的肥缺，是冯保的重要财源。然而胡自皋犯案，证据确凿，不能不惩治。张居正绞尽脑汁，严办了胡自皋，却保护了冯保不受牵连，最后还买了冯保的面子，放胡一条生路，没有问成死罪，只以流放结案。冯保对张居正的良苦用心也心知肚明，不得已而舍亲信以自保。用一句现代的表述方式来说，张居正和冯保的关系，是在根本利害一致的大前提下，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虽有斗争，但却绝不至于闹僵，决不会撕破面皮，从而导致联盟破裂。

这样，在李太后和冯保与张居正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以张居正为主导的大的利害关系相一致的权力联盟，熊召政称之为“铁三角”。这是一个左右当时朝政，号令天下的权力铁三角。这个铁三角由于其自身权位和利益的考虑，既能够彼此协力，相互声援，使张居正厉行改革的重大举措得以实行，取得实绩，同时又决定了这些改革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甚至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结局的悲剧性。

张居正的性格被熊召政写得充实又丰富，他的性格的多个层面，是在他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中，被渐次展示出来的。在《张居正》里，所有人物都与主人公发生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在诸多关系中，铁三角的关系还是最基本的。这种关系不只是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的关系，也是性格之间相互冲撞出火花的关系，体现出他们各自的思想、品性、情感波流、人性欲望等的关系。张居正的性格的一些主要方面，就是与他们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同时，李太后与冯保的性格也是在与张居正的关系中，被作家的很有力度的传神笔墨凸现了出来。

应该说，李太后的形象也是写得相当成功的。她笃信释佛，冯保取得她的宠信，就是拿了胡自皋花3万银子买的那串佛珠进献给她的结果。她明大体、识大局，知道她的丈夫隆庆皇帝宾天之后朝局的危急之处，也明白她们孤儿寡母的势单力薄之处。她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害，在内廷，黜孟冲而用冯保；在外廷，则废高拱而擢居正，应该说都是正确的决断。虽是妇人，却无“妇人之仁”，而是在关键时刻，在最关键的用人问题上，敢下决心，毫不犹豫，毫不手软，行动果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马换将，把最后的拍板权牢牢地操控在自己的手里。她让足智多谋的张居正懂得，自己的首辅是她给的；能给予，当然也能像对待高拱那样剥夺。张居正常常感到的天威难测，在朱翊钧渐渐成年之后是指朱翊钧，而在这之前，则是指李太后。当然，如前所说，李太后内心深处还不时涌动着某种不便明言，而当事人又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于张居正的爱慕之情，这是要用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才能分析出端倪的东西。应该承认，熊召政对此的描写是很细致、很传神的，而艺术分寸又掌握得极好。

如果说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态度是尊重、爱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深信不疑，那么，冯保对张居正的态度则是一种敬重，其中又包含了几分戒惧，几分警惕，有些时候还使用一点小智术进行牵制。从艺术上看，这个形象甚至比李太后还写得丰满，写得立体。比如写他的书法，写他的度曲和抚琴，看是闲笔墨，闲情趣，却也并不游离于人物性格之外。单从文笔上看，也斐然可观。

张居正、李太后、冯保这个铁三角写好了，作品的基本骨架也就立起来了。在此中，当这三个人先后离开政治舞台的中心时，“万历新政”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在豪强巨室的殊死反对中推行改革

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新政”是厉行改革的结果，他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改革家的历史地位，也是在“万历新政”的推行和创造中，渐渐确立起来并得到后世的公认的。

改革，在任何时候都是物质利益的再分配，有人失，有人得。获益者会兴高采烈，欢

呼雀跃；丧失者则会如丧考妣，拼死反对。哪怕是如张居正这样的意在维持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非常不彻底，非常有限的改革，也不例外。

无论是从有关的历史著作，还是从熊召政所创造的历史画卷中，都不难看出张居正面临的严峻、险恶的社会环境和官场风浪。他要维持朱明王朝的统治，从而保住自己的权位，就不能不革除那些由来已久的弊端，缓解已经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消弥、至少是延缓危机的暴发，这就必然会把改革的严重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张居正的改革，多数都带有抑制豪强巨室的性质，如作品写到的苏木胡椒折俸，稽查籽粒田收成以及此中弊端，整顿吏治，惩办贪贿，还有清丈天下田地，实行“一条鞭法”税制等。所以，张居正的改革虽使得普通百姓受益，使国库充盈达到有明一代之最，从而出现了延续近十年的“中兴气象”。但是他却因此而大大地得罪了一大批勋臣贵胄、豪门巨室、皇亲国戚。他后来的人去政废，祸延子孙，差一点被发墓鞭尸，就与这些人对他的仇恨有关。

正因为改革是对着豪强巨室的巧取豪夺而来的，侵犯了他们的某些利益，他们便会利用他们的权力和他们盘根错节的关系和网络，拼死反对。这就成了对张居正的改革决心和施政魄力的考验，不仅考验魄力，而且考验他的政治智慧。在熊召政的笔下，张居正敢于任事，多谋善断的人格魅力，就是从这接踵而至的严峻考验中被读者领略到，感悟到的。

然而，也有为难的时候。如果说清丈田亩时，面对山东的衍圣公孔贤和武阳侯薛沔，无论他们怎样的刁钻，怎样的权高势重，上下勾结，他都好下决心，敢于碰硬，捕起来再说。但是，一旦事情碰到现在的皇亲国戚头上，特别是李太后的父亲李伟和弟弟李高的时候，就让张居正颇费踌躇了。他不得不绕行，不得不开后门，不得不做必要的让步。由于李伟的贪鄙，小器，在诸如籽粒田征税等问题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豪强巨室们，总是把他推到前面打头阵，给张居正出难题。不看僧面看佛面，他能把当今圣上的外公和舅舅怎么样呢？比如李伟在籽粒田的租税上比往年多损失了些银子，王崇古便把20万套戍边将士军棉衣的制作交给了这位武清伯，张居正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了。谁知李伟贪得无厌下手太狠，截留银子太多，以致棉衣质量低劣，冻死长城上戍边士卒19人。事发之后，朝野议论汹汹，武清伯演了一出假自杀的闹剧。张居正不仅没有从武清伯手里追回他截留的20万两银子，不伤他一根毫毛，而且只是处死那大俠，惩办胡自臬了事。

豪强巨室，勋臣贵胄，皇亲国戚，既是封建皇权的既得利益者，又是这一政权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支柱。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抛弃这个特殊利益群体，而只是要对他们稍加节制，从而釜底抽薪，防止下层民众揭竿而起，导致王朝倾覆的可怕后果。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张居正所有改革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改革，也会改到自家头上。张居正的父亲张老太爷，倚仗儿子的权势，在张居正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地方贪官的献媚，把一千余亩公田据为己有，而且隐匿逃税。此事被派往荆州主持税改的金学曾发现，上报张居正。这件事令张居正异常震惊，也令他难堪。他平素对家人子弟约束甚严，但事情出在父亲身上，却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这也是对他改革决心和意志的考验。他没有徇私情而忘公义，而是退出了这些田地。并且在太后和皇帝面前自扬家丑，承担责任，真诚反省，以致李太后深为感动。另外，他还严格自抑，不慕虚名，不搞花架子。他亲自下令派缙骑兵拆毁了知府赵谦花巨资在他家乡为他建造的石碑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深知他的“万历新政”的每一步都是在豪强们的激烈反对和

拼死抵制中推向前进的。他和他们结怨甚深，深得无法化解。他生怕自己因为疏忽大意，思虑不周，或行为失检，而有什么把柄在对手的手里。所以，熊召政在写张居正雷厉风行推进改革的同时，异常谨慎，如履薄冰。

更难的是当他的施政和李太后、朱翊钧母子的某些利益直接冲突时，他就只能违心地妥协、让步，甚至委曲求全了。例如国库空虚，已经到了苏木胡椒折奉的捉襟见肘的程度，李太后为皇帝初次出席经筵一事却要花十万两银子。张居正本想节俭从事，不讲排场，但冯保说话隐含威胁，他也只能照办；苏木胡椒折奉，武清伯带头闹事，李太后绕过内阁直接下旨让户部给勋臣国戚直接给付纹银，张居正再难也不能让皇帝收回成命，还要设法照办了；还有，按照规矩和惯例，皇帝用的赏赐的银子，不能从户部直接调用，但是万历却直接下旨从户部调拨20万两纹银给内府，张居正也不敢硬抗，虽然打了折扣，毕竟划拨了10万两银子过去。还有李太后的修佛寺，皇上的做袍服，武清伯的修坟山，他虽然都觉得过于铺张浪费，也都一一照办了。

张居正虽然采取了抑制豪族的许多政策，但他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这种身份，就决定了在根本上他与这些人的利益的一致性。这个群体以及作为他们的政治代表的皇权，从各个方面制约着他，使他不可能走得太远。这一切，在熊召政的笔下，都得到了细致而具体的展示，从而使张居正的性格更见真切。

爱玉娘：他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在整部小说中，张居正都好像纠缠在没完没了的政务中，都在为国事、为朝廷操劳，要处理各种急的、缓的、大的、小的矛盾和问题，他的一些主要性格层面，都是从处理这些看不到尽头的事务和解决与各种人物的关系中被揭示出来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位忠谨、勤勉、雄才大略，刚毅果断而又远见卓识的旷世能臣。然而他也是人，一样有人的七情六欲。而与玉娘的情爱关系，就相当充分地展示了这位摄政大臣内心深处柔情似水的一面。

玉娘出身青楼，邵大侠为她赎了身，并把她进献给高拱。高拱年高无嗣，邵大侠进献玉娘，是希望玉娘能为这位当时正做着首辅的人传宗接代，也是邵大侠邀宠的一种方式。怎奈高拱不好女色，遂使这位美丽聪慧而又性格刚烈的青楼女子被长期冷落，独守空房。高拱被逐，到京南驿，玉娘欲随侍，被高拱坚拒，竟羞愤触柱，额血如注。后虽拣回一条命，却又一次沦落烟花场中，双目失明。幸被五城兵马司巡城御史王篆所救，这才有了此后与张居正的一段情缘。

张居正对玉娘是很欣赏的，京南驿演唱的那一曲《木兰歌》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用他的话来评价，叫“色艺双佳”。而此女的触柱，也引发了他对她身世的探究欲望。这是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秉性高洁的女性，而性格的刚烈，亦与张居正相通。

张居正自得到玉娘后，对她疼爱有加，置之积香庐而金屋藏娇。繁忙的公务之余，便到玉娘的身边，从两情相悦中获得灵魂的抚慰。虽然谈不上明媒正娶，玉娘连个侍妾的名分也没有，但却心心相印。她的抚慰成了张居正生命的一个重要支点，玉娘的出走，曾让他遗恨绵绵。

在熊召政的历史长卷中，玉娘的形象和性格是写得很有亮色的。作家写出了她的外貌之美，更写出了她的内在之美。她的内美，是一种品性之美，主要表现为她的贞烈和知恩图报。

《木兰歌》后的撞柱，是她贞烈最初的表现，但她找错了对象，高拱并不懂得她的情感的价值。张居正是懂得爱的价值并且珍爱她的人，她也能够感受到张居正对她的恩爱。尽管出于政务缠身，张居正与她总是欢会少而别离多，而且每一次欢会，又都是短暂的。在她独处积香庐中时，不免常常产生哀怨的情思，这使张居正长怀歉疚之情。然而，在张居正，能如此，就很不容易了。

因为要营救犯事的邵大侠，她先是跪求过接她进宫的李太后，不久她又跪求张居正，希望张能够念她们情份而援手放生，而网开一面。邵大侠是她的恩人，她始终不忘邵大侠救她出水火的恩德。然而，张居正虽然此前曾在她的央求下给邵写过联络漕运总督王篆的专函，但杀邵大侠，让邵大侠替武清伯受过，既是李太后母子的旨意，也是他张居正下了决心的事，因而他异常震怒，竟煽了玉娘一个耳光。这个耳光，让玉娘感到张居正是铁了心见死不救的，也让玉娘明白了自己在张居正心目中的真实地位。无论欢会时如何的柔情缱绻，但与张居正的政事权谋比，她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不点，轻于浮尘。

于是愤而出走，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两情相洽，保存了许多美好记忆的积香庐，那个张居正总是来去匆匆的地方，再没有回来。她人是离开了张居正，而且直到张居正病死，都没有再见过他，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却时刻关注着这位幸辅的命运休咎，她曾在夺情一事中托人带过一首戒诗给张居正。张居正死后，人去政废，家族罹祸，坟茔荒芜。她却从扬州前往荆州为张居正祭扫哭坟，一曲悲壮的《火凤凰》歌罢，她便饮鸩殉情而死。全部四卷《张居正》，也就在她萦绕不去的悲歌声中结束。

在张居正开创的“万历新政”的格局中，在可以用张居正的名字作标识的那10年的社会生活中，玉娘这样美丽的弱女子绝不占什么重要地位。但是在熊召政《张居正》的人物画廊里，她却扮演了类似《霸王别姬》里类似虞姬的角色，并非可有可无。这不仅因为缺了她，张居正的某些性格层面就出不来，就会被完全政治化，而且因为这个形象本身也写得很成功，很有个性，很见亮色。再说，就全书的叙事结构来看，作者也赋予她相当重要的美学价值和象征意义。四卷小说，至少两卷，即首卷和末卷都是以她演唱的歌曲《木兰歌》和《火凤凰》的曲牌为题的，而且，这两卷都收束于她刚烈凄美的自杀故事。想为高拱殉情而未遂，高拱不值得她为之生，为之死；但张居正值得。在张居正身后相业尽废，至亲零落，士林噤口，门生故旧星散的孤寂境况下，她以自己贞洁的生命殉情而死，浓墨重彩地给张居正的历史地位做了悲剧性的评价。

杀何心隐：张居正思想和性格的负面

在《张居正》里，由这位宰辅直接下令处死的两个人物，都是死不当罪的。一个是邵大侠，一个是何心隐，这两个人物在熊召政的笔下，都写得个性鲜明，特点突出。

邵大侠之死，我们在前面分析玉娘和张居正的爱恨情缘时曾略有涉及。从作品所给予